

王彬彬: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



《费城的钟声》
王彬彬 著
译林出版社 2020年8月



文学评论家、文学史家王彬彬 受访者供图

王彬彬说过:“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,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。”这句话,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。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那么突出?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。

在王彬彬看来,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。完全可以说,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知道得越多、越深,就越可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解得更准确、深刻。当然,他不是为了文学研究而去读历史书的,而是本来就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兴趣。

事实上,他写的谈论非文学问题的文章,比谈论文学问题的文章要多得多。所谓非文学问题,其实也就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问题。

他的这些“非文学文章”基本上发表在《钟山》杂志上。其中,写陈独秀的《皆起于此夜之会》《沪宁线上的鼾声》,比较鲁迅与胡适的《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》,《瞿秋白的不得不走、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》等等,都是影响巨大的名篇,被收入过各种文集或选集。

新书《费城的钟声》汇集了王彬彬近年发表的新作,收录《陈宝箴的喉骨》《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》《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》《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种内忧》《国共两党与白话文》等10篇文章。

作者从新的问题角度剖析国民党历史是非,缕析曲直长短——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,阻止国民党要员投敌,周旋于美英苏各盟国之间,却终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渐渐失去民心……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积重难返的旧矛盾,“之乎者也”终被“白话连篇”打败,这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选择。

“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兴趣,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、命运感兴趣。我作为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,从来不认为自己只应该写文学方面的文章。我愿意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。”在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采访时王彬彬说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陈曷

王彬彬
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文学评论家,文学史家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

“我关心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性,而不是因果”

读品:2002年您开始在《钟山》杂志开设专栏,迄今已经发表专栏文章超过80篇,是在《钟山》发表作品最多的作者。能说说您当初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吗?梳理18年的专栏写作史,思路和选题方向上是否有过调整?原因是什么?

王彬彬:在《钟山》上开专栏,是出于贾梦玮先生的邀约。我还记得是在江苏作协旧址颐和路附近的一次晚饭桌上,那时的贾梦玮,还是一个“小编”呢。最初的栏目好像叫“文坛旧事”,都是谈论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,后来好像还叫过“钟山记忆”,最后才固定为“栏杆拍遍”。谈论的话题,也从文学史、文化史上的人物、事件,转向近代以来政治史、军事上的人物、事件。平时读书,觉得有些史料十分有趣,但又不足以支撑学术论文式的研究,如果以历史散文、学术随笔的方式把这些史料蕴含的文化和人性方面的信息释放出来,是很有意思的。正好梦玮命开专栏,就答应了。至于后来逐渐转向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,有两种原因:一是我本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,这方面的东西读得比较多一点,接触的史料和积累的想法,能够让我勉强坚持写这种样式的文章;另一个原因,是因为写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,读者面更广阔些。毕竟,对文学和文化人物、事件感兴趣的人,没有对政治、军事人物和事件感兴趣者多,而对文学、文化感兴趣者,一般也不会对政治、军事人物和事件没有兴趣。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领域,题材也有过几次转换。在中共党史领域写过不少文章;后来转向现代史上的国民党方面,也写过好几年;再后来,关于义和团运动,写了若干篇文章;现在这是以北洋时期为取材范围。

读品:其实这类历史散文也

很常见,如何才能另辟蹊径?作为文学评论家,您感知历史的角度的专业的历史学家有何不同?

王彬彬:我写这些历史散文、学术随笔,当然与学术体制内的“论文”有差别。但坚持史料都注明出处。写散文、随笔而坚持做详尽和比较规范的注释,是我决不放弃的原则。去年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了一篇《愧对钱玄同》,后面一大堆注释。程永新先生说,《收获》创刊以来,从未发表过带注释的作品,但可以为我破次例,我十分感动。我之所以坚持这样做,是避免掌故化,甚至八卦化。现在关于近现代人物的以讹传讹的谬说,太多了。例如,总有人把“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说成胡适的“名言”,胡适什么时候说过这种不负责任的话?例如,总有人说陈寅恪与鲁迅在日本同学几年,甚至还同住一宿舍,哪有这样的事情?

我写这些历史散文、学术随笔,与历史学家学术研究的差别,恐怕有三点。第一,我感知历史的角度不同,我感知历史的角度,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一般不会选取的;我所关注的许多问题,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一般不会注意到的,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“局限”,而是说我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是带有非专业性和文学性的。第二,专业的历史学家,关心的是历史中的因果,而我关心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性,是人性在历史剧变、历史灾难中的各种表现。第三,我的表达方式与专业的历史学家是很不一样的,或者说,常常是专业的历史学论文所不允许的。我力求表达得平实、准确、清晰。在表达上有时也有些文学化,但我总是把文学化控制在一定的限度,过于文学化的表达,是会冲淡真实性的,会使文章变得软塌塌,而我力求文章硬棱棱,有骨感,有硬度,力避软塌塌。

总的来说,我在《钟山》上写的这类文章,还是一个文学专业背景者对历史的感受和表达,是带着文学的胎记的。能这样坚持下来,当然首先要感谢读者的鼓

专业的历史学家,关心的是历史中的因果,而我关心的更多是历史中的人性,是人性在历史剧变、历史灾难中的各种表现。

励。《钟山》这个“名旦”,版面何其金贵,我是常怀感恩之心的。没有贾梦玮先生的督促,也不可能坚持下来。贾先生这个人,作为编辑,择稿严格,但决定刊用的稿子,最大限度地尊重作者的意愿。有时候,我在现有词汇中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我的感受、想法,便生造一个词,从编辑的专业眼光看来,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但只要我生造得还说得通,梦玮便保留着,他自己当编辑时不改,当了主编后也不让编辑改。所以,长期的合作,十分愉快。

对鲁迅和胡适,抑此扬彼或弃此取彼,都是荒谬的

读品:这其中诞生了诸多名篇,包括写陈独秀的《皆起于此夜之会》《沪宁线上的鼾声》,比较鲁迅与胡适的《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》,《瞿秋白的不得不走、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》,等等。您关注的知识分子都各具个性,您觉得他们身上有着什么共通的品质吸引着您?

王彬彬:吸引我的与其说是他们的个性,毋宁说是他们的命运。在二十世纪,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,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。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被革命所决定。他们各自的命运是极其耐人寻味的。

读品:您如何评价胡适?针对“扬胡抑鲁”的现象,您写了《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》这样的文章,但您也写了《胡适的驻美大使当得怎么样》,指出胡适在抗战紧要关头的中美外交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作为一个思想者、一个知识分子,相比鲁迅,胡适“逊”在何处?

王彬彬:胡适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,在那样一个时代,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台湾的李敖,是我很不喜欢的人。十几年前,我们请美国的林毓生教授来南大作讲座,林毓生教授在讲授中称李敖为文化流氓,我有点惊讶,也有些快意。但是,李敖对胡适的评说是很中肯的,他写了一本研究胡适的书,叫《播种者胡适》,我觉得书名很好,“播种者”这个定位是很准确的。鲁迅与胡适的差异、冲突,其实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两人各有所长,又各有局限。对两人在文化成就方面的比较,其实没有什么意思。两人都有互逊之处。鲁迅逊于胡适之处,主要在于对“制度”与“人性”的关系理解不如胡适深刻,而胡适逊于鲁迅之处,在于对中国历史、中国社会、中国人的国民性,认识远不如鲁迅深刻。对于后人来说,抑此扬彼,甚至弃此取彼,是荒谬的。

读品:“鲁迅”始终贯穿着您的研究。您的鲁迅研究和别人有何不同?

王彬彬:鲁迅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,一个坐标性人物,一个碑石般的人物,在他身上凝聚着巨大的历史内涵和

时代内涵,这是一个极其复杂、各种矛盾纠缠于一身的人物,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、中国社会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在他身上得到反映。简言之,鲁迅思想内涵的丰厚、复杂和深邃,是使得我一直对鲁迅有研究热情的原因之一。另一种原因,则是鲁迅语言无与伦比的文学魅力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,鲁迅的语言造诣是非常独特的。至于我的鲁迅研究与别人有何不同,那我说了不算,要由旁人来说。

读品:对如今“言必称鲁迅”——鲁迅没说过的话也要记在鲁迅名下这种现象,您怎么看?

王彬彬:这是近年出现的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。微信上常常看到那种以鲁迅名言出现的帖子,实际上根本不是鲁迅说过的话。这说明两个问题:一,鲁迅说过的许多话,仍然对今天的现实有直接的针对性,这才使得一些人把自己对现实的评说,安在鲁迅名下。当然,他们并非蓄意伪造鲁迅言论,而是一种文化幽默,多少带些游戏的性质。二,说明鲁迅的确是不朽的,多少年来,骂鲁迅的人不少,但鲁迅在今天却以这样一种方式被“利用”,鲁迅地下有知,应该满脸苦笑,同时也无限悲哀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有一位严肃的鲁迅研究者写过一篇《鲁迅对九十年代文化现象的批判》,他罗列的是鲁迅对三十年代文化现象的批判,然而却处处击中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。这当然也是一种幽默手法。今天那些假鲁迅之名出现的批判性言论,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是能够接受这种幽默性的做法的。每当看到这类的“鲁迅言论”,我都莞尔一笑。看到这种伪造的鲁迅言论,你会感到鲁迅确实了不起。鲁迅当然有欠缺,有局限,一棵参天大树,哪能没有虫眼,没有空洞,没有腐坏的地方呢?对鲁迅的欠缺、局限具体地分析、研究、批判,都是可以的,但要想从根本上摧毁鲁迅,那绝对是蚍蜉撼树,注定成为笑柄。

关心中国现当代历史,就是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、命运

读品:《费城的钟声》收录的文章实际上都超越了文学的范畴,涉及现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,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。您的本业是做文学批评,为何对历史投入这么大的精力?由文史入史,这其中有着哪些始终关注的焦点?

答:前面说过,在《钟山》上的专栏,很早就超出了文学的范围。我本科阶段是学外语的,研究生阶段才转为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专业。我认为,一个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,完全没有专业意识,是肯定不成的,但专业意识过于强烈,也是不好的。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,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,完全可以,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知道得越多、越深,就越可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解得更准确、深刻。当然,我不是为了文学研究而去读历史书的,而是本来就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兴趣,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感兴趣,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、命运感兴趣。我作为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,从来不认为自己只应该写文学方面的文章。我愿意生活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处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